

左 拉

金 满 成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3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李琪树
封面设计：余所亚

左 拉

金满成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哈尔滨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 印张3 8/16 · 插页2 · 字数74,000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200

统一书号：10093·506

定价：0.30元

目 次

第一章	一个值得介绍的法国作家	1
第二章	左拉的生平和德莱菲斯事件	5
	左拉的父亲是入了法国籍的意大利人	
	左拉生在巴黎，在南方度过童年	
	十八岁回巴黎后，生活十分贫困	
	在堆栈管理仓库，在书店当店员	
	计划《卢贡——马加尔家族》全书	
	德莱菲斯事件的真象，《我控诉》，逃亡英国	
	莫泊桑描写左拉形象	
	六十二岁时煤气中毒致死	
第三章	左拉的思想和他的时代背景	25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世纪儿	
	拿破仑第三统治下的法国	
	左拉断定资产阶级是反动派	
	左拉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派	
	左拉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左拉反对宗教	
	左拉的政治观点	
第四章	自然主义理论和左拉的写作实践	41
	自然主义的创始人不是左拉	
	自然主义的定义和原则	
	有关自然主义的一些理论	
	自然主义的优缺点	
	左拉在写作实践中违反自然主义	
	五人宣言和自然主义的衰颓	

第五章 反映社会现实的小说家	59
扬弃了自然主义，为人民而写作	
《小酒店》，一部如实地写人民的小说	
《萌芽》，法国第一部描写产业无产阶级罢工的小说	
一个人物和三部作品——《卢贡家族的家运》、 《贪婪》、《金钱》	
第六章 左拉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	83
左拉和浪漫主义的纠葛	
《梦》	
浪漫派的夸张手法	
左拉的理想主义	
《繁殖》	
第七章 左拉的工作方法和他的文体	92
写小说时的准备工作	
卡片的内容	
左拉自己对自己说话	
文体有点“重”	
写群团的能手	
小小的结论：基本上是一个进步作家	

第一章 一个值得介绍的法国作家

在十九世纪的许多法国作家中，左拉是值得我们介绍的一位。

左拉是十九世纪文艺思潮中一个重要的流派——自然主义——的代表人物。这个流派尽管它的寿命并不长久，而且它的理论值得批判的地方还很多，尽管左拉本人在写作的实践上，大大地脱离了它的规范，而它在当时，特别是在理论上，却起过一定的作用。它对那些好弄玄虚，不切实际，把文学摆在象牙之塔，与群众生活脱离的文艺风气，给予过猛烈的抨击，使大家耳目为之一新。这不能不说这是法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而这件大事是和左拉的名字分不开的。

左拉一生忠于文学事业，他在文学上的辛勤劳动，实在值得我们钦佩。不管他的生活是富裕或是贫困，不管他的作品受到批评或欢迎，他总是孜孜不倦地埋头写作。他在他的梅塘别墅的墙上用拉丁文刻上了这样一句座右铭：“没有一天不写一行”。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对于我，全部的生活都在劳动里”。从他从事写作到临死，不过三十几年的时间，共写了六十几部作品，字数在九百万字以上。这中间虽然有不少作品值得批判，但那是属于思想和作风问题，而不是因为他粗制滥造。为了把他的作品写好，他决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为了描写罢工，他亲身下到矿井和矿工们一起生活，诸如此类的事不胜枚举。在十九世纪下半世纪的法国，应当说这是难能可贵的。

左拉一贯主张坚持真理维护正义，在他后期思想更成熟

的若干作品中，无数次地提到真理和正义的重要性。他一再诅咒他当时社会的黑暗、腐化、堕落……认为这种社会必须崩溃也必然会崩溃；认为正义和真理的社会必须到来也必然会到来。他不象许多作家那样只在书本上呼吁，而是身体力行。我们在下一章就要谈到的德莱菲斯事件出现时，他就挺身而出为受害者鸣不平，敢和当权者、大军官等有势力的人物正面冲突，以致弄得自己受到无限迫害，流亡英国。可是他决没有在敌人面前表示过一句屈服的话，他始终相信“真理在前进”，直到临死，他还在那里写题名《正义》的那部小说。

左拉一贯替人民说话。虽然，他的阶级观点在很长一个时期都是模糊的，直到写《四福音书》时，才在作品中使用阶级斗争这个口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但他一开始写作，就替人民说话。他所说的人民，是那些和特权阶级对立的其他许多阶层的人，尤其是指的劳动人民。他在不少的篇页中，都以同情的笔调描写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痛苦、人民的愿望。他一再说明当时人民的处境之不能忍受，认为人民早晚必定翻身。在矿工大罢工中，他已经发现了这种翻身的“萌芽”而予以大力宣传了。

左拉嘲笑资产阶级和统治阶级。他生长在资本主义成长时代，自己在思想上有不少资产阶级意识，但他却能在作品中对资产阶级的贪婪、吝啬、腐化堕落、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等予以揭露并加以嘲笑。对于统治阶级，他也没有放松。象那位赫赫有名的皇帝拿破仑第三，他在《崩溃》一书中就把他装扮成一个丑角和世人见面。

左拉极力反对宗教的迷信。在《三大名城》中，他把许多教徒（其中包括罗马教庭中坐在“圣座”上的教皇）借迷信骗

钱并且麻醉人民的斗争意志的种种事实，毫无顾忌地写了出来。不仅当时的主教、神甫之流把他恨之入骨，即到现在，所有的教会学校还把左拉的作品作为禁书。这也可以看出，左拉的反宗教力量是如何的强大了。

左拉的写作技巧，很多地方是可以提供给我们文艺工作者作重要参考的。《卢贡——马加尔家族》全书的伟大设计，以及每一部书的排场、布局都有一定的规模。他有时不说“写小说”，而说“建筑作品”，足见他对一个题材的处理是采取精心结构的办法，不肯马虎从事的。我们读他的好几部重要著作时，都感到他的每一章都代表一个情节的高潮，而且象戏剧似地发展，直到最后一幕为止，越来越紧地抓着读者的兴味。对人物的刻划深刻而细致，尤其令人惊叹的是，他不只是描写一个人、一件事，而是描写了许多人、许多事。所有的文艺批评家，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他是“写群团的能手”。这不能不说这是左拉的一种独到之处。

左拉是一个最受人欢迎的作家。我们把话说得通俗一点，那就是他的作品销路很大。这主要是因为，他写的是当时社会的现实而不是空想，所以广大人民喜欢他的东西。左拉的作品在国外也受到同样的欢迎。苏联从十月革命后到一九五一年止，翻译的左拉作品印数接近三百万册。中国在“五四”以后，虽然翻译力量还不很充足，但左拉的作品截至目前止，已译出了二十几种。解放后，左拉的重要著作不断地在陆续翻译出版。据了解，这些译著一般都很受欢迎。

左拉在他的作品中一再说过，新的社会必然到来，人类的前途完全值得乐观。果然，他死后不到二十年，他所猜想的事就实现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偌大的俄罗斯解放了，不到五十年，几亿人口的中国也解放了。我们执笔的这一

年，正是左拉逝世六十周年，全世界的形势更是全然改观了：资本主义社会已在崩溃瓦解之中，新的世界已发出巨大的光辉了。

总之，左拉是一个值得介绍的作家，因为他敦促进步，反对落后现象；热爱生命、反对死亡；追求光明，力破黑暗；同情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不管他自己的文艺理论如何，在写作的实践中，我们仍然要说他是十九世纪法国进步的现实主义作家。

第二章 左拉的生平和德莱菲斯事件

左拉的父亲是入了法国籍的意大利人

左拉出生在巴，在南方度过童年

十八岁回巴黎后生活十分贫困

在堆栈管理仓库，在书店当店员

计划写《卢贡——马加尔家族》全书

德莱菲斯事件的真象，《我控诉》，

逃亡英国

莫泊桑描写左拉形象

六十二岁时煤气中毒致死

左拉的父亲佛朗索瓦·左拉是一个入了法国籍的意大利工程师。他为了职业关系，曾经在奥国、荷兰、英国、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居住过。最后，在一八三〇年他才在法国定居下来，而且入了法国籍。这时他主要的工作是替马赛一个造船厂建筑船坞。由于他在工程上有发明创造的天才，所以很能取得别人的信任。他曾设计建造一条运河，把距艾克斯几公里的峡谷中的水，引来接济这个向来缺水的城市。他为了向政府提出这个引水计划的建议，得常常到巴黎去活动，以便得到政府批准后，募集资金组织公司。一八三九年，他在巴

黎认识了左拉的母亲，他们不久就结婚了。一八四〇年四月二日，爱米尔·左拉就在巴黎圣约瑟街十号那座楼房里降生了。

由于佛朗索瓦·左拉在巴黎活动相当有办法，他发明的掘土机试用成功，使建筑运河的计划有实现的可能。因此，他在一八四二年便带领全家到南方，长期住在马赛附近的艾克斯城经营他的事业。左拉的童年就是在南方度过的。

准予修建艾克斯运河的命令，直到一八四六年才正式发布。佛朗索瓦·左拉日日夜夜为这件工程操劳。不幸的是，这条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运河还没有建成，他就感冒了，不久转成肺炎，在一八四七年死于马赛的一个旅馆中。这时左拉的母亲才二十七岁，左拉才七岁。

工程师在世时，由于运河的成功大有希望，所以经济上并不感到困难。但人一死，情况就不同了，各方面的债主包围了年轻的孀妇，而那些欠工程师钱的人又乘机赖债，所以弄得这个家庭十分狼狈。还有运河工程的账目不清，法院的执达吏也来同左拉的母亲找麻烦。她的一点点储蓄早已用得精光，而诉讼费、律师费的勒索则无穷无尽。倘若不是住在波士省经营颜料业的外祖父母跑来帮忙应付债主、应付官司、应付生活上的一切困难，左拉母子俩的窘困，是无法解脱的。不过，尽管家庭处境如此困难，我们这位未来将有大发展的作家，还是一个被人宠爱、穿和吃一点也不短少的孩子。

左拉七岁时才开始在伊索阿尔老先生开设的一个私塾小学念书，但他在这里除了读《拉封丹寓言》外，把所有的时间都浪费在跑森林、田野和下河洗澡上。就这样过了五年之久，到一八五二年他满十二岁的时候，进了艾克斯市立公学。

这时，他改变了跑森林、田野的习惯，成了一个好学生，屡次得到学校的评奖。在这个公学里，他认识了巴伊和赛尚（巴伊后来成为科学家，赛尚成为全世界闻名的画家），他们三人后来成为极要好的朋友，时时在一起游山玩水，谈论文学与诗歌。左拉这时，狂热地爱着缪塞和雨果的诗，自己也写诗，写剧本，写历史小说。奇怪的是，以他这样的秉赋，拉丁文和希腊文又非常之好，而在后来进高级中学时，他却没有选学文科而愿意钻研科学。据说，那是为了承继他父亲的事业。总之，无论如何，这件事成为他后来想把科学的原则、原理应用到文学上去的一个因素。

一八五七年，左拉的外祖母去世了。这件事使他的生活有了一个极大的转变，因为在艾克斯再也没有亲人可倚靠的母亲，要到巴黎去寻求先夫的一些故旧，她一个人先去了。第二年，她从巴黎来信，要左拉和左拉的外祖父也去。于是，他们把在艾克斯还有一些东西通通卖掉，十八岁的左拉不得不离开他舍不得离开的南方风景和朋友，也就是说，他不得不脱离那诗意的生活，而和巴黎的现实生活面对面地搏斗了。

在巴黎，左拉得到父亲朋友的帮助，能够以官费生的资格进了圣路易中学的高级班，学习理科。按照左拉的愿望，他在科学上应当大有成就。然而事情很意外，高中毕业考试时，他在理科方面竟有两次不及格。这时因为家境困难，左拉既没有继续攻读的能力，更没有继续攻读的兴趣，因此他成了一个贫困、孤独、流落异乡的十九岁青年。这一事实逼着他去寻找一个职业，无论什么样的职业都可以，只要能帮助母亲一点点家用就好。一八六〇年他二十岁时，才靠了一个有力的人的帮助，在海关街某堆栈里找到一个管理货仓的

位置，月薪六十法郎。不行！这一点点薪水，不用说家用，连自己的零用都不够！何况又没有任何加薪的希望。他只好辞退这个职位，另谋出路。然而事情越来越糟，辞退这个职位后，一直到一八六二年，他甚至连一个月六十法郎的位置也找不到了。据左拉的女儿德妮丝·左拉后来的叙述，左拉这个时期的贫困是相当惊人的。他住在一个亭子间里，一顿饭如果有一块面包和一个苹果就算是最丰盛的了。他常常没有炉火，也缺乏灯光，他只有尽量节省几个铜板买点蜡烛来从事写作。他常进当铺去排队当东西，有时还因为没有衣服而不敢出门。莫泊桑的笔记中有一段关于左拉这一段生活的叙述：

有一个冬天，他全靠吃油浸面包过活，这是他的朋友给他寄来的艾克斯出产的油。他那时还乐天知命地说：“只要有油，人就不会饿死了”……有时，他在屋顶上下圈套，捕捉麻雀，用一根窗幄上的小铁签串起来烤着吃。

最能说明这一时期作家的生活情况和思想情况的，还得算左拉自己在一八六一年五月给他好朋友巴伊的一封信中所写的：

一年多以来，我都在猛烈地追逐职业。可是，尽管我追得很快，而职业却逃跑得比我更快……我进了门，我找到一位全身穿黑的先生，他正把头埋在一张或多或少堆了些东西的写字台上……好，一连串的问题和一连串的进攻开始了。始终是那一套，总不外乎：你的书法还好么？你会记帐么？你曾经在什么机关服过务？你的专长是哪一项？……等等。接着就是：求职业的人太多了，他真难以应付，他们的机关已经有人满之患，再没有空额了。他劝我忍耐一点，到别处去设法。我呢，心里十分难受，匆匆地逃跑了出来。没有成功使我悲哀，但不再呆在这个可怕的屋子里，却也叫我痛快。

我觉得我所有的良知良能，我的仁爱心，上帝赋予我的一切都在我身上动摇起来了。我诅咒这个社会……它只知道使用人的劣根性。我一想到我不得不在这样的社会机构中充当一个角色，就感到无限的恶心。我仿佛听见有声音在我的耳边响动，述说着我念念不忘的梦想，并且轻轻地道出“自由”、“爱”、“和平”、“上帝”这几个悦耳的词汇。①

可是左拉并不是一个悲观失望的人，他和许多寻找出路的青年人一样，脑子中有千万种打算。他在塞纳河的河岸街上浏览旧书，阅读莎士比亚、乔治·桑、雨果、米舍勒、狄德罗、蒙田、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他不仅想在文学方面找一条出路，而且想充当一个文艺上的革新人物。只是他这时还没有建立起他的理论系统，他写的许多诗，许多小说，都还脱离不了浪漫主义的窠臼。

一八六二年二月，左拉的生活上又有了一种小小的转变。他父亲的一个朋友布德医学博士介绍他到阿舍特书店的事务科工作。他整天得做钉箱子、扛箱子、打包裹等粗重活儿，月薪也不过一百法郎。这在当时，也只够维持一个人的最低生活。后来，由于他把一部题名为《恋爱喜剧》的诗剧稿送给老板路易·阿舍特先生看，大大地受到老板的赏识，立刻提升他为广告科科长，月薪改为二百法郎，左拉这才不致于那么贫困了。这时，艾克斯的朋友巴伊和塞尚都到巴黎来了。左拉是不习惯于把自己的私生活写进作品中的作家，但在《作品》这部书中，却对他们三个形影不离的好朋友的生活写得不少。此书中的克罗德就是塞尚，桑多兹是左拉，杜比式便是巴伊。《作品》中叙述了一件有趣的事：克罗德穷得雇不起太多的模特儿时，桑多兹曾替他作模特儿，站在画

① 见《左拉书信集》第137页。

室里几小时不动。塞尚到巴黎后又替他介绍了一些后来成为名画家的青年画家。这时，作家的生活便再也不寂寞了。左拉决定用每周的星期四来招待朋友，谈论文学艺术等问题。这些朋友中，后来还加入了福楼拜、都德……等文坛上出名的人物。另外，他的广告科科长的身份，也使他同当代的新闻记者及作家等的接触，有了便利的条件，使他从事写作的兴趣浓厚起来了。书店老板阿舍特格外鼓励左拉，他希望左拉为《青年日报》写一篇故事性质的东西。可是当左拉把一篇题名《穷人的姐姐》的短篇小说送去时，却因为这篇小说太革命而被拒绝了。不过，这件事并没有阻碍左拉前进的道路。这时，好多日报已出现以“左拉”署名的批评文章。同时，阿舍特书店不肯出版的另一部小说《给尼依的故事》，也于一八六四年在赫治——拉克罗瓦书店出版了。接着，一八六五年又出版了《克罗德的忏悔》。这部书说起来不过是《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一类的小说的仿制品，但它却给左拉带来了一些灾害。官方批评家认为它有伤风化，巴黎警察局长和内政部长提请司法当局注意。后来虽因为罪名不能成立而没有迫害左拉，但警局方面却搜查了作家的办公室。他们说他曾在被禁止出版的共和派报纸《劳动报》发表过一些诗。书店老板不免怕了起来，左拉不得不于一八六六年离开阿舍特书店。

左拉在阿舍特书店工作了四年，这四年是有成绩的。他的散文集《我的憎恨》就在他离开的那年出版了。据左拉自己说，离开书店后，他是在作新闻记者。实际是他做了好几家报刊的特约撰稿者。有的报刊，如巴黎的《要闻日报》、《费加罗》，里昂的《公共福利报》都约他写评论文章；有的报刊，如马赛的《普罗旺斯消息报》则约他写长篇连载小

说。《马赛的秘密》便是先在这个报上连载，后以单行本形式于一八六七年出版的。这个时期左拉的收入是相当不错的，除《要闻日报》的每月稿费五百法郎之外，赫治——拉克罗瓦书店每月也预支给他五百法郎的版税，还有其他的零星收入。尽管左拉的言论遭受到若干方面的责难，左拉的小说也受到一些批评家的讥笑，但作家由于有了物质生活的保障，所以他一面能安心在图书馆内钻研学问，以完成他的一套自然主义的理论系统，一面也能有时间来计划后来使他成名的巨著《卢贡——马加尔家族》。这套书一共有二十部，总的内容正如它的副标题所示，是“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全书约六百万字，先后写了二十五年。作者计划要写进去一千二百个人物，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是那个家族（包括父系母系）中的先后五代人，三十二个成员。除总书名外，每一部另有单独的书名，都可以独立成书。如在社会上极其出名的《小酒店》、《金钱》、《崩溃》等等，都是其中的一部。作者对这套书的计划极其完备，他为那三十二个成员作了一个树枝分桠式的族系图表，每个成员下附有一个简单的说明，标出他们的生年死月和先天性或遗传性的特点，以及一生遭遇的重大事件。同时，按照小说家的需要，把他们分派在社会上充当军人、政客、投机分子……种种角色。

一八六八年，《德莱丝·拉甘》出版了。这部书也遭到批评界的攻击。他们把这部书和龚古尔兄弟的《日耳曼妮·拉塞德》并列为“溃烂的文学”。左拉在《德莱丝·拉甘》的再版序言中对这次攻击作了一个有力的答辩。这篇序言成了他说明自然主义的主要文件之一，这倒是那些批评家们完全没有想到的。

一八七〇年，正是他的《卢贡——马加尔家族》全书的第一部《卢贡家族的家运》在报上陆续开始发表的时候，普法战争爆发了。作家这时正三十岁，按兵役法还得服某一级的兵役。但因为他眼睛近视，又是独养子，得以免服兵役。这年五月，他同和他恋爱了六年的麦丽小姐结了婚。新夫人有病，医生说需要到南方休养一个时期，左拉便带着妻子和母亲一道去马赛居住。原来打算住不久就回到巴黎，可是巴黎被普鲁士人包围了，他只好决定留在马赛，并得到《普罗旺斯消息报》的主持人阿诺的协助，创办了一个名叫《马赛报》的报纸。左拉虽然在报上写过不少文章，但办报却是外行。他找不到消息的来源，资金也不充分，报纸不久就停刊了。同时，左拉由于受批评界的攻击，立论又不同凡俗，许多报刊这时甚至不敢登载他的文章。因此，这两年的生活又陷入贫困的境地。在他一八七六年写给俄国作家波波雷金的自叙中说：

现在已经十年了——我一直靠我的笔尖过活，与其说是好，不如说是坏。一般人都打击我，时常完全不承认我。自然，我赚钱赚得很少，比我们这里报馆的文艺作家要差得多。我的脾气使我在报馆工作的时候，时常弄出一些麻烦的事情。自从我能够完全脱离报馆工作而关在家里写我的小说，还不到四年。①

这是一八七〇年左拉生活的一个很好的概括。

在马赛办报失败后，左拉有意谋求一个固定的职业，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这时拿破仑第三已经在色当大败，投降后作了俘虏。巴黎方面成立了国防政府，左拉认识国防政府中一个委员克莱——毕左安，这时这个委员正到波尔多来出席国民会

① 见《瞿秋白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1162页到1192页。

议，左拉在一八七〇年十二月去找到了他。据说，这个委员曾留他作身边的秘书，并介绍他去结识某行政长官，因而获得了一个县长的位置。但左拉没有去就任，他只担任了巴黎《钟报》驻国民议会通讯记者的职务。一八七一年二月，国民议会迁到了凡尔赛，左拉跟着到了凡尔赛，继续作《钟报》的通讯记者。同年三月十八日，巴黎的无产阶级起义，成立了巴黎公社后，《钟报》奉命停刊了一个时期。左拉就在这时回到巴黎，匿迹悄声地住在蒙马特贫民区。

一八七二年，左拉在福楼拜家里认识了屠格涅夫，他们立刻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一八七四年，都德和爱德蒙·龚古尔两人也加入了这一集团，成立了有名的五人聚餐会。一八七五年，屠格涅夫介绍左拉给在圣彼得堡出版的《欧洲消息》写文章，这些文章都以“巴黎来信”为标题发表，所写文章中除通讯外，也有论文和小说。左拉为这个杂志撰稿，先后有六年，共发表了六十三篇。有几篇小说，如《鲁贡大人》、《女福商店》等是先在《欧洲消息》上发表后，才在法国出版的。还有一些文章，直到现在还只有俄文的译文而没发现左拉的原稿。

有人说左拉是“一个散布风景的人物”，这是有相当根据的。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所发表的一些论文、小说，就引起过不少的风波。后来，《卢贡——马加尔家族》全书二十部先后发表时，几乎每一部都会引起一些争执；就是在《欧洲消息》上所登载的一些东西，在当时的俄国也引起了不小的纠纷，甚至于使杂志的编辑都不得不出来声明，说他们“并不完全赞成左拉的文艺理论”。就这样，一八八一年以后，左拉就不再在《欧洲消息》上发表通讯了。

一八七七年，《小酒店》出版了。这是《卢贡——马加